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

—— 早期北京话研究书系

主编 郭锐

早期北京话语法演变 专题研究

刘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早期北京话研究书系
主编 郭锐

早期北京话语法演变 专题研究



刘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早期北京话语法演变专题研究 / 刘云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2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

ISBN 978-7-301-29832-9

I. ①早… II. ①刘… III. ①北京话—语法—演变—专题研究 IV. ①H1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3937 号

书 名	早期北京话语法演变专题研究 ZAOQI BEIJINGHUA YUFA YANBIAN ZHUANTI YANJIU
著作责任者	刘 云 著
责任编辑	路冬月 邓晓霞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832-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3027
印 刷 者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23.75 印张 318 千字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

现代汉语共同语历史研究

(18JJD740001, 2018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总 序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有历史。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体现在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及其语言和方言之中。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国都(辽时为陪都),千余年来,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政治中心。北方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产生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带有民族文化风味的特色文化。

现今的北京话是我国汉语方言和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支,它与辽金元明四代的北京话是否有直接继承关系还不是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清代以来旗人语言文化与汉人语言文化的彼此交融有直接关系。再往前追溯,旗人与汉人语言文化的接触与交融在入关前已经十分深刻。本丛书收集整理的这些语料直接反映了清代以来北京话、京味儿文化的发展变化。

早期北京话有独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于中华文化、历史有特别的意义。

一者,这一时期的北京历经满汉双语共存、双语互协而新生出的汉语方言——北京话,它最终成为我国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这一过程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自然形成的诸过程之一,对于了解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关系的具体进程有重要的价值。

二者,清代以来,北京曾历经数次重要的社会变动:清王朝的逐渐孱弱、八国联军的入侵、帝制覆灭和民国建立及其伴随的满汉关系变化、各路军阀的来来往往、日本侵略者的占领等等。在这些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北京人的构成有无重要变化?北京话和京味儿文化是否有变化?进一步地,地域方言和文化与自身的传承性或发展性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与社会变迁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清代以至民国时期早期北京话的语料为研究语言文化自身传承性与社会的关

系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全国的文化和科研中心,新的北京话和京味儿文化或正在形成。什么是老北京京味儿文化的精华?如何传承这些精华?为把握新的地域文化形成的规律,为传承地域文化的精华,必须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及其形成过程进行细致的研究和理性的分析。而近几十年来,各种新的传媒形式不断涌现,外来西方文化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强烈,北京地区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老北京人逐渐分散,老北京话已几近消失。清代以来各个重要历史时期早期北京话语料的保护整理和研究迫在眉睫。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暨早期北京话文献数字化工程)”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由“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早期北京话数据库”和“早期北京话研究书系”三部分组成。“集成”收录从清中叶到民国末年反映早期北京话面貌的珍稀文献并对内容加以整理,“数据库”为研究者分析语料提供便利,“研究书系”是在上述文献和数据库基础上对早期北京话的集中研究,反映了当前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

本丛书可以为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素材。

愿本丛书的出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王洪君 郭锐 刘云

2016年10月

早期北京话的语言研究价值

——“早期北京话研究书系”序

早期北京话指清中叶至民国时期的北京话。北京话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极其特殊而重要，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普通话的语音标准是北京语音，普通话的词汇和语法也与北京话有密切联系。因此，要探讨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的来源，不能不涉及北京话。由于缺乏足够的材料，元明清初的北京话还无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与今天的北京话有直接的继承关系的北京话材料在清中叶才开始出现。但此时的北京话地位并不高，书面语传统也不够深厚，全国的通语是南京官话，而非北京官话。到1850年前后，北京话才取得通语的地位，并对日后的国语和普通话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不过汉语学界对早期北京话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对早期北京话材料了解不多，更重要的原因是重视不够。研究汉语史的，重视的是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研究现代汉语的，重视的是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普通话语料；研究方言的，重视的是地方方言，尤其是东南方言，而北京话与普通话较为接近，晚清民国时期的北京话反倒少人问津，成了“三不管地带”。

随着清中叶至民国时期北京话语料的挖掘、整理工作的开展，早期北京话的面貌开始清晰地展现出来。根据初步考察，我们对这一时期北京话的语言研究价值有了大致的认识。可以说，清中叶以来的北京话是近代汉语过渡到现代汉语的桥梁。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晚清民国时期，即19世纪40年代至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北京话以及作为全国通语的北京官话、国语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这些变化奠定了今天普通话的基本格局，而1950年

至今的普通话则没有大的变化。

下面我们看看北京话在晚清民国时期发生的一些变化。

从语音方面看,变化至少有:

1. 庄组字翘舌~平舌交替

庄组字本来都读为舌尖后翘舌声母,其中大约30%今天读作舌尖前平舌音。但在晚清时期,有些字仍读作翘舌音,以威妥玛(Thomas F. Wade)《寻津录》(*Hsin Ching Lu* 1859)的记音为例:“瑟”读shê、“仄”读chai。还有相当一部分字有翘舌和平舌两读,形成文白异读:所(so~shuo)、涩(sê~shê)、责(chai~tsê)。另外,有些字今天读作翘舌声母,当时却有平舌声母的读法,如:豺(ts'ai)、侧(tsê)。

2. 声母ng彻底消失

北京周边的河北、山西、山东方言,中古疑母字的开口呼一般保留ng[n]声母,影母字开口呼也读ng声母。清末的北京话还保留个别的ng声母字,如:饿(ngê)、恶(ngê)[富善(Chauncey Goodrich)《华英袖珍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 〈*Chinese-English*〉 *Pekingese Syllabary* 1891)]。普通话中,ng[n]声母完全消失。

3. 见系二等字舌面音声母和舌根音声母的交替

见系二等字在全国多数方言中仍保留舌根音声母,当代普通话中大部分见系二等字读作舌面音声母,但有约四分之一的见系二等字保留舌根音声母的读法,如“隔、革、客、港、耕、衡、楷”等。普通话中读作舌根音声母的字,在清末的北京话中,有一部分有舌面音声母的读法,如《华英袖珍字典》(1891)的记音:楷(ch'iai~k'ai)、港(chiang)、隔(chieh~kê)、揩(ch'ieh)、耕(ching~kêng)、耿(ching~kêng)。今音读作舌面音声母的见系二等字在稍早还有保留舌根音读法的,如《寻津录》(1859)的记音:项(hang~hsiang)、敲(ch'iao~k'ao)、街(chieh~kai)。

4. o~e交替

今音读作e[ɿ]韵母的字,对应到《寻津录》(1859),有两个来源,一个是e[ɿ]韵母,如:德(tê)、册(ts'ê)、遮(chê);另一个是o韵母,如:和(ho)、合(ho)、哥(ko)、刻(k'o)、热(jo)。从o到e的变化经历了多音并行和择一留存两个阶段,如:酌(chê~cho)、刻(k'o~k'ê)、乐(lo~lê)、洛(lê~lo)、额(o~ê)。在《华英袖珍字典》(1891)中,“若、弱、热”都有两读:jê或jo。最后择一保留的,有的是e韵母(刻、乐、热),有的是o韵母(酌、洛、若、弱)。

5. 宕江摄入声文白异读

《寻津录》(1859)中宕江摄入声文白异读主要是韵母o/io和ao/iao的差异,如:若(jo~yao)、约(yo~yao)、薄(po~pao)、脚(chio~chiao)、鹊(ch'io~ch'iao),这样的文白差异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已产生。二三等文读为üe韵母大约从1850年前后开始,《寻津录》(1859)中只出现了“学略却确岳”五字读üe韵母文读音。之后的三十来年间,短暂出现过üo韵母,但很快合并到üe韵母。üe作为文读音全面取代io韵母,大约在19世纪末完成。

晚清民国时期白读音的数量要明显多于当代的读音。如下面这些字在当代读文读音,而在当时只有或还有白读音:弱(jao)、爵(chiao~chio)、鹊(ch'io~ch'iao)、学(hsio~hsüeh~hsiao)、略(liao~lüeh~liao)。

6. 曾梗摄入声文白异读

曾梗摄入声字的文白异读,主要是e(o)韵母和ai韵母的差异,这样的格局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没有改变,但清末北京话的文白两读并存要明显多于当代,如《华英袖珍字典》(1891)的注音:侧(ts'ê~chai)、泽(tsê~chai)、责(tsê~chai)、册(ts'ê~ch'ai)、拆(ts'ê~ch'ai)、窄(tsê~chai)、宅(chê~chai)、麦(mo~mai)、白(po~pai)、拍(p'o~p'ai)。

7. iai韵母消失

“解、鞋、挨、携、崖、涯”等蟹摄开口二等见系字在《音韵逢源》

(1840)中,韵母为iai。到《寻津录》(1859),只有“涯”仍有iai的异读,其他字都读作ie韵母或ai、ia韵母。之后iai韵母完全消失。

8. 清入字声调差异

清入字在普通话中的声调归并分歧较大,但在清末,清入字的声调归并分歧更大,主要表现就是一字多调现象。如《寻津录》(1859)中的清入字声调:级(chi²~chi⁴)、给(chi³~chi⁴~kei⁴)、甲(chia¹~chia³)、节(chieh²~chieh³)、赤(ch‘ih¹~ch‘ih⁴)、菊(chŭ¹~chŭ²)、黑(hei¹~hei³)、骨(ku¹~ku²~ku³)、铁(t‘ieh³~t‘ieh⁴)、脱(t‘o¹~t‘o³)。这些多调字在当代普通话中一般只有一种调类。

次浊入在清末民初时期读作非去声的情况也较多,如:入(ju³~ju⁴)、略(liao⁴~lio³~lüeh³)、麦(mai¹~mai⁴)。

以上这些成系统的语音变化有的产生更早,但变化结束并定型是在清末民初时期。

除此之外,一些虚词读音的变化也在晚清民国时期发生并定型。

助词和语气词“了”本读liao,在19世纪30年代或更早出现lo的读音,常写作“咯”,这应是轻声引起的弱化读法。此后,又进一步弱化为la(常写作“喇”“啦”)、le[lə]。“了”的音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读音	liao	lo	la	le
开始时间	19世纪30年代前	19世纪30年代	19世纪50年代	1908

而语气词“呢”和助词“的”,也分别经历了ni——na——ne[nə]和di——da——de[tə]的语音弱化阶段。

语气词“啊”的语音变体,在当代普通话中有较为严格的条件,而晚清民国时期“啊”音变的条件与之有所不同。“呀”(ya)可以出现在:-ng后(请问贵姓呀?/《小额》),-n后(他这首诗不曾押着官韵呀!/《儿女英雄传》),

-u后(您说有多么可恶呀! /《北京风俗问答》), 舌尖元音后(拿饭来我吃呀。/蔡友梅《鬼吹灯》)。“哇”可以出现在-ng后(做什么用哇? /湛引铭《讲演聊斋》)。这种现象与现在汉语学界所讲的语流音变条件似乎并不吻合, 到底应如何分析, 值得深入探讨。

此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读音, 也在早期北京话材料中有所反映。

“俩”读作lia, 一般认为是“两个”的合音。但在晚清北京话材料中, 有“俩个”的说法。这似乎对合音说提出了挑战, 更合理的解释也许应该是“两”受到后一音节“个”的声母影响, 导致韵尾脱落, 然后是“个”的脱落, 形成“俩”直接修饰名词的用法。

一些词汇的特殊写法, 则反映了当时的特殊读音。有些是轻声引起的读音变化, 如: 知得(知道)、归着(归置)、拾到(拾掇)、额啦大(额老大)、先头啦(先头里); 有些则是后来消失的白读音, 如: 大料(大略)、略下(撂下)。

可以看到, 北京话在清代发生了一系列的语音变化, 这些变化到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基本结束, 现代汉语的语音格局在这个时期基本奠定。那么这些变化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是北京话自发的变化还是受到南京官话或其他方言的影响产生的, 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早期北京话的材料找到答案。同时, 这一时期北京话语音的研究, 也可以为普通话的审音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

词汇方面, 晚清民国时期的北京话有一些异于普通话甚至当代北京话的词语, 如: 颞膝盖(膝盖)、打铁(互相吹捧)、骑驴(替人办事时在钱财上做手脚以牟利)、心工儿(心眼儿)、转影壁(故意避而不见)、扛头(不同意对方的要求或条件)、散哄(因不利情况而作罢或中止)、胰子(肥皂)、烙铁(熨斗)、嚼裹(花销)、发怯(害怕)、多咱(什么时候)、晌午歪(午后)。

为什么有一些北京话词语没有传承到普通话中? 究其原因, 是晚清民国时期汉语共同语的词汇系统, 经历了“南京官话——北京官话/南京官话——

南北官话混合”三个阶段。根据艾约瑟《汉语官话语法》(1857)、威妥玛《语言自述集》(1867)等文献记述,在1850年前后,通语由南京官话改为北京官话。当时的汉语教科书也由南京官话改为北京官话。不过,南京官话并没有消失,而是仍在南方通行。因此,南北官话并存成为晚清语言生活的重要特征。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编著的汉语教科书《官话类编》(1892)就是反映南北官话并存现象的重要文献。下面的例子是《官话类编》记录的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的词汇差异:

A		B		C	
北京官话	南京官话	北京官话	南京官话	北京官话	南京官话
白薯	山芋	耗子	老鼠	烙铁	熨斗
白菜	黄芽菜	脑袋	头	日头	太阳
煤油	火油	窟窿	洞	稀罕	喜欢
上头	高头	雹子	冰雹	胰子	肥皂
抽烟	吃烟	分儿	地步	见天	天天
扔	丢	自各儿	自己	东家	老板
馒头	馍馍	些个	一些	巧了	好像
多少	几多	姑爷	女婿	光顾	留意

南北官话并存和对立的局面在民国时期演变为南北官话的混合,南北两种官话合并为一种共同语,即国语。作为国语的继承者,普通话的词汇,有的来自北京官话(如A列),有的来自南京官话(如C列),有的既来自北京官话,又来自南京官话(如B列)。普通话中与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无关的词不多见,如:火柴(北/南:取灯儿/洋火)、勺子(匙子/调羹)、本来(原根儿/起根儿)。那些在今天被看作北京土话的词汇,实际上是被南京官话挤掉而未进入普通话的北京官话词汇,如:胰子、烙铁、见天。

晚清时期北京话语法在研究上的重要性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普通话的不少语法现象,是在这一时期的北京话中萌芽甚至发展成熟的。如兼表致使和被动的标记“让”的形成、受益标记“给”的形成、“程度副词+

名词”格式的产生、协同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跟”的产生等。二是普通话的不少语法现象,与晚清北京话有差异。比如:

1. 反复问格式:普通话的带宾语的反复问格式有“V否VO”(吃不吃飯)、“VO否VO”(吃饭不吃饭)、“VO否V”(吃饭不吃)等格式,但在晚清时期北京话中没有“V否VO”格式。

2. 双及物格式:普通话有“V+间接宾语+直接宾语”(送他一本书)、“V给+间接宾语+直接宾语”(送给他一本书)、“V+直接宾语+给+间接宾语”(带一本书给他)、“给+间接宾语+V+直接宾语”(给他带一本书)四种常见格式,晚清时期北京话没有“V+直接宾语+给+间接宾语”格式。

3. 趋向动词与动作动词构成的连谓结构语序:普通话可以说“吃饭去”,也可以说“去吃饭”,而晚清时期北京话只说“吃饭去”。

4. 进行体的表达形式:普通话主要用“在VP”“正在VP”,晚清时期北京话主要用“VP呢”。

5. 被动标记:普通话用“被、让、叫、给”,晚清时期北京话主要用“让、叫”。

6. 协同、伴随介词:普通话用“和、同、跟”,晚清时期北京话主要用“跟”。

7. 时间起点介词:普通话主要用“从、打”,晚清时期北京话主要用“打、起、解、且、由”。

8. 时间终点介词:普通话用“到、等到”,晚清时期北京话用“到、赶、赶到”。

可以看到,晚清时期北京话的有些语法形式没有进入普通话,如时间起点介词“起、解、且”;有些语法项目,普通话除了采用晚清时期北京话的语法形式外,还采用晚清时期北京话没有的语法形式,如反复问格式“V否VO”、双及物格式“V+直接宾语+给+间接宾语”、被动标记“给”。这些在晚清时期北京话中没有的语法形式容易被看作后来普通话发展出的新语法形式。但如果联系到晚清南北官话的并存,那么可以发现今天普通话的这些语法形式,其实不少是南北官话混合的结果。下面看看晚清南北官话语法形式的差异:

	语法项目	北京官话	南京官话
1	反复问句	VO不V, VO不VO	V不VO, VO不VO
2	双及物格式	送他书, 送给他书	送他书, 送书给他
3	去VP	VP去	去VP
4	进行体	VP呢	在VP
5	被动标记	叫, 让	被, 给, 叫(少见)
6	致使动词	叫, 让	给, 叫(少见)
7	协同介词	跟	和, 同
8	并列连词	跟	和, 同
9	工具介词	使	用
10	时间终点介词	赶, 赶到	到, 等到
11	时间起点介词	打, 起, 解, 且, 由	从

从上表可以看到, 普通话语法形式与清末北京话的语法形式的差异, 其实很多不是历时演变导致的, 而是南北官话混合带来的。

普通话的语法形式与词汇一样, 也是南北官话混合的结果。词汇混合的结果往往是择一, 而语法混合的结果则更多是来自南北官话的多种语法形式并存。因此, 要弄清今天普通话词汇和语法形式的来源, 就必须对清末民初北京话的词汇和语法以及同一时期的南京官话的词汇和语法做一个梳理。

朱德熙先生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1987)一文中认为, 由于普通话, 特别是普通话书面语是一个混杂的系统, 应把普通话的不同层次分别开来, 北京话是现代汉语标准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 因此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应首先研究清楚北京话口语语法, 才能对普通话书面语做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朱德熙先生的观点非常深刻, 不过朱先生在写作这篇文章时, 主要是从方言成分混入普通话角度讨论的, 还没有认识到普通话主要是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的混合, 我们今天对早期北京话的研究为朱德熙先生的观点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支持。早期北京话的研究, 也可以对朱德熙先生的观点做一个补充: 由于普通话主要是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混合而成, 所以研

究现代汉语语法不仅要首先研究北京话语法,还需要对普通话中来自南京官话的成分加以梳理。只说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是不够的,南京官话是普通话的第二基础。

此外,早期北京话文献反映的文字方面的问题也值得关注。早期北京话文献中异体字的使用非常普遍,为今天异体字的整理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其中一些异体字的使用,可以弥补今天异体字整理的疏漏。如:

有一天,一個狐狸進一個葡萄園裡去,瞧見很熟的葡萄在高架上垂掛著,他說:“想必是好吃的。”就咂着嘴兒讚了讚,驢蹠了半天,總搆不着。

(《伊苏普喻言》(1879))

“搆”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处理为“构(構)”的异体字,但根据原注“搆:读上平,以物及物也”,不应是“构”之异体。查《华英袖珍字典》(1891)，“搆”释为“to plot, to reach up to”，“plot”可看作“构”的意思，而“to reach up to”的意思是“达到”，因此，这种用法的“搆”应看作“够(伸向不易达到的地方去接触或拿取)”的异体字。“驢蹠”，原注“驢:上平，驢也”“蹠:去声，跳也”，根据注释和文意，“驢蹠”应为“蹠纵”，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把“蹠”处理为“踪”的异体，未看作“縱”的异体，也未收“驢”字。

早期北京话呈现出来的语音、词汇、语法现象，也为当代汉语研究的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的窗口。比如：“啦”到底是不是“了”和“啊”的合音？晚清民国北京话的研究表明，“啦”并不是“了+啊”的合音，而是“了”弱化过程的一个阶段。普通话的同义词和同义句式为何比一般方言多？这是因为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词汇和语法的混合形成国语/普通话，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中不同的词汇、语法形式并存于普通话中，就形成同义词和同义语法形式。“给”为何可表被动但不表致使？被动标记和致使标记有密切的联

系,很多语言、方言都使用相同形式表达致使和被动,根据语言类型学和历史语法的研究,是致使标记演变为被动标记,而不是相反。但普通话中“给”可以做被动标记,却不能做致使标记,似乎违反了致使标记演变为被动标记的共性,这是为什么?如果从南北官话的混合的角度看,也许可以得到解释:南京官话中“给”可以表致使,并演变为被动标记;而普通话中“给”的被动标记用法很可能不是普通话自发产生的,而是来自南京官话。因此表面上看是普通话“给”跳过了致使标记用法直接产生被动标记用法,实质是普通话只从南京官话中借来了“给”的被动标记用法,而没有借致使标记用法。这些问题在本书系的几部著作中,都会有详细的探讨,相信读者能从中得到满意的答案。

早期北京话研究的先行者是日本学者。1876年后,日本兴起了北京话学习的热潮,出版了大量北京话教材和资料,为后世研究带来了便利。太田辰夫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早期北京话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北京话的七个特征。其后辈学者佐藤晴彦、远藤光晓、山田忠司、地藏堂贞二、竹越孝、内田庆市、落合守和等进一步把早期北京话的研究推向深入。国内的研究起步稍晚,吕叔湘等老一辈学者在研究中已经开始关注《白话聊斋》等民初京味儿小说,可惜受制于材料匮乏等多方因素,研究未能延续。北京大学是北京话研究重镇,林焘先生对北京话的形成有独到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带领北大中文系1979级、1980级、1981级汉语专业本科生调查北京话,留下了珍贵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蒋绍愚、江蓝生等先生倡导,局面有所改变。深圳大学张卫东,清华大学张美兰,厦门大学李无未,中山大学李炜,北京语言大学高晓虹、张世方、魏兆惠,苏州大学曹炜等学者在早期北京话的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深入研究。2007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将北京话研究作为中心的重要研究方向,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度挖掘新材料,即将面世的“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刘云主编)将为研究者提供极大便